

谈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

张 华 腾

郑观应(1842—1922)字正翔,号陶斋,别号侍鹤山人,广东香山县(今中山县)人,是一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,戊戌变法前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。他的维新思想,倾注在其著作《盛世危言》一书中。书中他论述广泛,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各个方面,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,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。

—

十九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,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,“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,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”^①。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的邻邦——缅甸、越南、朝鲜等变成殖民地的同时,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,在用武装疯狂地侵略中国的同时,加紧进行经济侵略。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对华倾销商品。其结果,不仅使中国手工业部门遭受了沉重打击,日益衰落下去。而且“洋布、洋纱、洋花边、洋袂、洋巾入中国,而女红(工)失业;煤油、洋烛、洋灯入中国,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;洋铁、洋针、洋钉入中国,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。此其大者,尚有小者,不胜枚举。……华人生计,皆为所夺矣”^②。在这个时期,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也在逐年增加,外国资本家在华开设银行,发行钞票,向清政府发放大量的政治贷款,逐渐操纵和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。它们投资交通运输,独霸了内河、沿海航运,非法在中国开办工厂,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,获得高额利润,严重压抑和排挤中国民族工业的成长,刚刚诞生的民族工业面临着毁灭的厄运。

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,代表这一时期的先进的中国人——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、马建忠、薛福成、陈炽、郑观应等都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,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。如马建忠说:“欲中国之富,莫若使出口货多,进口货少”^③。薛福成指出:“中国多出一分之货,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”^④。陈炽强调必须“振兴商务,开拓利源,出土地之所藏,以与之征逐互市”^⑤。阅历比较广,维新思想比较成熟的郑观应,以更完整、更明确的形式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,响亮地提出了大力发展民族工商

业，与帝国主义进行“商战”的口号，“彼以商来，我亦当以商往^⑥”。他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危害大，“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，特患我之夺利权，凡致力于商务者，在所必争”。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，他主张采取兵战进行抵抗，但“兵战之时短，其祸显”，而“商战之时长其祸大^⑦”，所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，应该把商战放在首要地位。

二

郑观应所说的商战，非字面上商品之战、商人之战的狭隘理解，而是有着广泛的、丰富的内容，它既有流通领域的买和卖，又有商办的一切近代企业，包括资本主义生产、流通领域的各个部门，有集中中华民族之经济实力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决战之意。不过甲午战前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输出，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危害最严重、最直接，所以郑观应也就把商战摆到首位，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，也就以“商战”的形式出现。

郑观应认为，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，目前这个积贫积弱的局面是不行的，必须振兴我们的商务。他大声疾呼，“欲制西人以自强，莫如振兴商务^⑧。”“我之商务之一日不兴，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^⑨。”如何振兴商务？郑观应根据自己的几十年来所见、所闻、所经，精心设计了这样一套完整的方案：

郑观应指出，要振兴商务，必须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以商致富、以商致强的经验学过来，不用自己再从头去摸索，这是一条捷径。他说，“今日虽振兴商务，要当效法泰西^⑩。”他研查了英国由于商务“讲求最精”，而今在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全过程。他还特别留心与中国隔海相望，昔日同中国一样贫困的日本，因近二三十年学习西方卓有成效“国势日兴”的典型经验，“夫日本商务，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，处处借西邻为先导，我为其拙，彼形其巧，西人创其难，彼袭其易^⑪。”这就是说，西方在很长时间，花极大气力得出的经验，日本袭来就用，日本既然有效，中国何不“转而相师”^⑫呢？他把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有实效、速度快的日本学西方的经验摆在中国人民面前，给中国人民提出了最直接的新课题。

郑观应强调，要振兴商务，发展民族工商业，必须重视科学技术，采取机器生产，以提高劳动生产率，降低生产成本，从而才能在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他说，“国家欲振兴商务，必须通格致、精制造。”“论商务之源，以制造为急，而制造之法，以机器为先^⑬”他积极倡导和发展民族机器制造业，对当时各种机器都需进口的情况非常不满。他说购买机器，只能解决一时之需，非根本之计。在购买过程中外国奸商又往往格外居奇，要价甚高，而且多以用过之机器售于中国，中国“暗受其欺”。再者购来之机器，偶一损坏，仍需请人修理，如果洋人不修理，那么有机器如无机器。最

根本的办法是我们自己“宜设厂制造机器^⑭。”中国民族机器制造业设立后,应先以西方的机器自行仿造,取得经验,再发明制造新机器。用郑观应的话就是:“取泰西所制造者,求其理,而穷其故,因泰西所已制之物,进而求泰西所未制之物^⑮。”有了自己的机器制造业,就可以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工作母机,使整个生产领域完全摆脱外人的控制。当时的洋务派在“求强”、“求富”的口号下也办了几家机器制造厂,但始终摆脱不了外人的羁绊,成效甚微。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任要职,比较了解内幕,他对洋务派的做法深为不满,批评他们“徒效皮毛,仍如隔靴搔痒,有名无实”。他还断定:如这样继续下去,不但不能使国家富强,“必致国困民穷,不堪设想矣^⑯。”洋务运动的终极结果,如郑观应所预料,由此见他的眼光。

郑观应有几十年经营工商业的实践经验,他知道单靠在生产领域里使用先进技术,机器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,还不一定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外国商品竞争,还必须新式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设备,才能降低运费和了解商情。他十分重视铁路、电报、邮政等企业的兴办。他在《修路》篇里说,“修铁路之效远且大矣。如国中往来大道一律整齐,则运费必轻,物价必贱,用物与造物之人两得其益”。他又举例说开平煤矿,因运道不便,价格很贵,而修建了铁路,“则运费减半,而煤价即减半^⑰。”电报邮政等与商品生产、商品流通的关系也十分密切。他说,“邮政不行,跬步之间远于千里,人通则我塞,人迷则我迟,人明而我暗,日皇皇然,忧贫患寡,而不知大利之所在^⑱。”

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,必须发展近代工业、近代交通等,而工业、交通业的发展,必须具备动力和原料。郑观应这个经营专家深知道这一点。他呼吁开发祖国资源,大力发展采矿业,“居今日而策富强,开矿诚为急务矣^⑲。”他对祖国各地矿藏了如指掌,比如云南的铜锡,山西的煤,贵州的铁,齐鲁荆襄的铅等。但由于“中国风气未开,积重难返^⑳”以致于开矿者不少,仅有开平煤矿有些成效。究其原因,一是封建顽固势力以谬谈风水为阻挠,一是封建官吏“多方剥蚀,设法侵渔,”使开办起来的诸矿半途而废。郑观应为此事气愤到了极点。他指责封建官吏使中国矿业不能开辟,“徒增帝国主义之垂涎”,痛骂阔谈风水的封建顽固势力,从今后再有阻止开矿者,“乃外人之功狗,而中国之蠹贼也^㉑。”

郑观应认为,要振兴商务,还有很关键的一点,即近代工矿企业,不能由官方控制,要听民自办;必须“全以商贾之道行之,绝不拘于官场体统。”所谓商贾之道,即商品流通的规律,资本家牟取利润之道。所谓官场体统,就是封建政府的垄断控制。他要求清政府,“凡通商口岸,内省腹地,其应于铁路、轮舟、开矿、种植、纺织、制造之处,一体准民间开设,无所禁止,或集股、或自办,悉听其便^㉒。”当时的洋务派,几乎垄断了近代企业。其经营方式,不外是官办,官督商办、官商合办,这里的“官”是加在企业上的一副沉重枷索。企业内部,虽然是大机器生产,但企业管理,充满着浓

厚的封建气息。郑观应毫不掩饰地提出批评,“我国创一厂,设一局,动称官办,既有督,又有总,更有会办,提调诸名目^{②③}。”这么多封建大吏控制局务,他们“商贾之道”一点不懂,胡乱开支却是内行,每年仅正款就达数百万计,“浮友冒领,供挥霍者不少,肥私囊者尤多,所以制成一物,价比外洋昂率过半^{②④},”凭什么去和外国商品竞争!

郑观应有较强的民族气息。他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,指出要振兴商务,与洋人“商战”,还必须争得华洋人权平等,取消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特优地位,加重海关进口税,取消厘金,才能在商战中获胜。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半个世纪中,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大小小的数百个不平等条约,取得了协定关税、领事裁判权、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。郑观应对此愤愤不平,“然所立之约,就通商一端而言,何其矛盾之多也?如一国有利,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^{②⑤}?”他对海关行政权操纵在外人手里更为不满,坚决要求撤换,“应明定章程,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,为总税务司,其他各口税司、邦办等,皆渐易华人,照章办理,蔗千万巨款权自我操,不致阴袒西人,阻挠税则^{②⑥}。”甲午中日战后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,帝国主义又取得了在华开办工厂的权力,开始竞相向中国进行大量资本输出,“方今门户洞开,任洋商百般垄断,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,就地取材,以免厘税,其成本较土货更轻,诚喧宾夺主,以攘我小民之利^{②⑦}。”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这些特优条件和先进的科学技术,以压倒一切的优势,限制、压抑我民族经济的发展,必须采取对策,“重订税则,厘正新章,务将进口之税大增,出口之税大减^{②⑧}。”对于那些不平等条约,他极力要求在有机可乘之时……均可删改^{②⑨},“与洋务派的‘各国条约已定,断难更改’”(李鸿章语)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经过多年经营工商业的实践,郑观应深深体会到,工商业的发展,商战的胜利,还有更重要的一条,即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,否则就是一句空话。这种政治制度就是郑观应梦寐以求的议会制度,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同掌政权的君主立宪政体。此外,商战的胜利,还有赖于兵战的配合。郑观应强调商战的重要性,还说过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”^{③⑩}的话,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兵战。他反侵略思想中明显有两条战线,“当今之时,谋人家国事,必须以通商、练兵二者为尤。亟通商以为富,练兵以为强^{③⑪}。”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列强进行商战,为强兵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,而兵强了,才能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,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。

为了振兴商务,郑观应还要求设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商务机构。工商业的发展又急需培养人才。所有这一切,郑观应一一考虑到,筹划得可谓详密细尽。

郑观应天真地想到,如果自己设计的这一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案都能实现的话,那么“数十年后,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西欧并驾者,吾不信也^{③⑫}。”他憧憬着中华民族这个工商业大国将在东方崛起,在同帝国主义长期的商战中获得胜利,一定会“强

泰西而上之^{③④}。”甲午中日战后，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，郑观应这个民族资本家，能够乐观地瞻望未来，发出这样的豪迈壮语，其思想境界竟达到如此高的地步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三

郑观应的商战思想，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进步的经济思想，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，激励起了人们反帝救国的热忱，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对后来的维新变法高潮的到来，也起了思想上的先导作用，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不过，当时的中国，已经跃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，不但经济上大大落后于帝国主义列强，而且丧失了政治上、经济上的独立自主，根本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商战。再者，郑观应把商战的希望寄托在腐朽的清政府身上，其结果，好的愿望只能以失望而告终。

注：

①列宁：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，《列宁选集》第二卷，第798页

②③④郑观应：《纺织》，《盛世危言》增订新编，卷七，页20、23

③马建忠：《富民说》，《适可斋记言》，页2

④薛福成：《商政》，《筹洋刍议》，页27

⑤陈 炽：《庸书·自叙》外篇，卷下，页74

⑥⑨郑观应：《商战下》，《盛世危言》卷三，页44、49

⑦⑧⑩⑪⑫⑬《商战上》，《盛世危言》卷三，页43、47

⑧⑨⑫《商务三》，《盛世危言》卷三，页10、12、13

⑩⑪《商务二》，《盛世危言》卷三，页4、8

⑬⑭⑯《商务五》，《盛世危言》卷三，页18、19

⑮⑯⑰《技艺》，《盛世危言》卷四，页36

⑰《修路》，《盛世危言》，卷七，页38

⑱《邮政上》，《盛世危言》，卷六，页24

⑲⑳《开矿上》，《盛世危言》，卷四，页17、21

㉑《开矿下》，《盛世危言》，卷四，页26

㉒《公法》，《盛世危言》，卷五，页18

㉓《税则》，《盛世危言》，卷四，页4

㉔《商务一》，《盛世危言》，卷三，页2